

018341

中国会馆志

王先英



中國會館志編纂委員會編

方志出版社



中國會館志

王先英



編委會主任——胡德平

編委會副主任——謝伯陽

主編——周均美

副主編——谷彥芬

王熹

特別鳴謝

怡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偉宏女士對《中國會館志》出版事務的真誠支持

方志出版社

序

孫孚凌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中華民族的形成、繁衍、統一及其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明清以來的會館與相關遺存，便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中國歷史上的會館，明永樂年間在北京首見雛形，經發展演變，到清末始趨衰落；而華僑在世界各地所創建的華人會館，至今仍興盛不衰。會館既是該歷史時期社會背景下的產物，更是團結本鄉同胞的一種場所，是一種特有的政治、經濟、文化事象。其數量之多、分佈之廣、影響之大、延續時間之長，是歷史上罕見的。歷經滄桑，會館已走過了近六百年的歷程。會館是緣於鄉誼而建的群體性的自衛自律自治組織，有政治型、工商型、移民型、海外華人型等諸多類別。它們在各自的領域，為促進社會政治、經濟的加速發展，區域經濟的繁榮、文化交流的加速、商品流通的擴大、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中華文明的傳播，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為世人所矚目。

《中國會館志》一書，以翔實的資料，展示了會館的發展、演變過程，介紹了會館的各種類型與分佈，會館與市場商品經濟、與人口流動遷移的關係，特別記述了海外華人會館的興起以及對中外文化的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書中對會館的文化內涵、歷史地位及多種功能作用進行了闡述，以歷史文獻為據，以諸多會館建築遺存為證，在評述了諸家之言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以為後人了解會館歷史、

14

進一步深入研究會館歷史提供盡可能豐富的資料和新的思路。

鑒往可知來，明理可啓智。江澤民同志曾經說過：“一個民族不善於從歷史中繼承和發展本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正確地探索歷史發展規律，既有利於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更有利於現實的創造和未來的開拓。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國貫徹鄧小平理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各地的辦事機構將團結本鄉人士，以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中心，為本地區及全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而努力。高新科技的迅猛發展，更印證了文化實為人類創造智慧的巨大源泉。從會館發展的歷史中，總結其興衰得失，可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服務。這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傳承文明的工作，願更多的有識之士關心參與並為此作出努力和奉獻，以利當世，惠及後人。

是為序。

2002年10月25日

導 言

胡德平

今天年紀稍長一些的人提起會館、公所、商會多少還有些印象，特別是商會，更爲人們所熟悉。近代以降，中國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機，自明清以來曾得到快速發展的中國民族工商業受到外國經濟勢力的挑戰和重壓。全國各地的工商業者突破行業的界限，聯合起來組成商會，爲創造有利於中國的市場環境，維護中國工商業者的權利，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局勢激變下的新商戰。這些工商業組織以自己的實踐在中國近當代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他們爲中國經濟的發展，也爲民族的獨立解放、國家的民主、和平、繁榮強盛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中國工商業的發展經歷了數百年的艱難歷程。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者沉浮商海，始終不乏團結進取的精神和傳統。歷史上，他們曾有過創業的艱辛，也曾有過拓展事業的喜悅；但越近現代，越飽嘗發展工商業的辛酸苦澀。挖掘和整理這段歷史，就是爲了從歷史中汲取營養以滋今日之事業。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以迅猛不可阻擋之勢席捲全球，把越來越多的國家自覺不自覺地納入了“世界歷史”；各國相互影響活動的範圍在當代歷史的進程中越來越擴大，各民族閉關自守的狀態和格局完全被打破。從社會發展的根本上看，這同社會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然而，每個不同的國家總要按照本國本民族的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前進。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屬於後發展的國家，更需要在自己的起點上把握自己的特色，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尋找發展的機

遇，奮勇拼搏，才可能在世界大市場的競爭中獲勝。

經濟的發展不僅僅局限在單純的物質生產和交換範圍內，它需要全方位的開放：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江澤民同志曾經說過：“一個民族不善於從歷史中繼承和發展本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自己走過的路是自己最好的向導，自己的實踐是自己最值得珍惜的財富。

中國工商業者的組織商會發展和活動的基礎——中國會館，有着遠勝於近代商會的悠久歷史。它的興盛衰替、成功與失敗、經驗和教訓對於後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和工商界的人士仍有可資借鑒和供研究的價值。這也就是編著《中國會館志》的目的和意義。

會館，字義上可簡釋為供人聚會的屋舍。中國的會館尤以其獨特的內容、形式和久遠的歷史聞名於世。它是古代迺至近代中國同籍或同業的人在京城、省府及大商埠設立的一種民間特殊機構，主要以固定的館邸供同鄉、同業者聚會或寄寓。這已成為當今人們對會館的基本認識和理解，本書記述和討論的內容也基於此。資料的上限為明代永樂十三年(1415)，自會館誕生起；下限不定：因為會館自明代以來，經過清代和民國時期的發展、繁榮和衰變，又傳播至海外，至今華僑聚居地仍保存着中國會館。

會館是明清商品經濟急速發展，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變遷的產物，尤以明萬歷和清康熙、乾隆年間為多。會館最初的作用是“聯鄉誼，叙鄉情”，“恭祀神明，使同鄉之人，聚集有地”。隨着工商業的發展，會館也逐步成為商人們居住、存貨和議事的重要場所；繼而又由同一地區同一行業的商人或手工業者組成商業或其他行業性會館。至清道光、咸豐年間，這些行業性會館有的演變為公所。公所按行業集結，有按同籍組成也有跨籍的。

會館制訂行業條規章程，實施同鄉同業的行業管理，對外調節官商關係和二者的利益，以會館組織的契約協調形式部分地代替了封建社會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如簽訂合同、調解商務糾紛，組織商民向政府投訴地方官府盤剝，及至近代聯合商民抵制、反抗外侮、捍衛主

權等。會館通過行規，為商人提供制度保障和有關市場交易及各地地方文化習俗等方面的信息服務。在保護商人利益、反不正當競爭方面，會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會館通過行規，要求會員保證商品的質量和標準，不得摻雜使假、缺斤少兩，不得哄抬物價、欺行霸市；要求會員遵守商業道德，“講信修睦”、“敦睦修義”、“勸誘德業，糾繩懲過”。在中國舊秩序下，國家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缺乏對財產權和商務活動的有效保護和規範，具有自我管理自治性質的會館彌補了這一缺陷。

辦理善舉也是會館行規中不可缺少的一項。所謂善舉，就是使同業中年老無依者，仍有所養，“病則醫藥，故則殮埋”。設置義塚，解決客死他鄉者的安葬問題；設置客房，解決經營者的駐足歇宿問題；提供資費，幫助貧困失業者解決部分生活問題；興辦義學，解決商人子弟的上學讀書問題。總之，會館行規的制訂和實施考慮了一般中國人生有所養、死有所歸的問題。從“敦鄉誼、崇信義”、“善過規勸”到主張“脫近市之習，敦本里之淳”，“通情愫、達音問、疾厄相扶”，“有無相資、為義甚大”的義利兼得、盛世德化，體現了中國商人力求達到並踐行的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觀的一種境界。也就是說，經商營利仍得以義為大、以誠為本；而市場競爭更應義利兼得。社會的進步和個人人格的完善對於工商業者同樣是必不可少的。

會館既然是一定歷史時期一定社會背景下的產物，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時代的變化，其作用自然會明顯減退（海外華人地區是例外）。本書以盡可能收集到的資料展示了會館的發展歷史、演變過程，介紹了會館的各種類型和分佈，會館與市場經濟、與人口流動遷徙的關係，特別記述了海外華人會館的興起和獨到之處。書中對會館的文化內涵和會館的歷史地位、功能作用也進行了分析探討，以歷史文獻資料為據，記述了多家之言，同時也提出了我們作為編者的一些觀點和想法。資料和歷代各家之言由於時間、條件和水平所限，很可能挂一漏萬，讀者從中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觀點和結論則屬一家之言，也盡可以爭鳴討論。

16

但是，毋庸置疑，中國的會館，包括它的建築和文化在內，都是中華文明中極富特色的一項遺產。它雖然是重農抑商的中國封建社會內，一個既非權力機構又非經濟實體的邊緣性民間自治組織的活動場所，但它能從物質形式到精神教化，通過行規章程職能管理，集結了一代又一代的工商業者，因此各式各樣的會館遍佈全中國，凡是有貿易的地方幾乎都有會館，對於一個規模如此龐大、歷時又如此之久的歷史現象、社會團體，我們難道能無視於它的存在，而不對它加以考察研究？即便是作為文物之一，各地現存的會館也是極有保存和保護價值的。看完這本書，人們一定會發現，中國的會館的確豐富多彩，它所凝聚的人文精神和精美的建築藝術充分體現了明清時代的歷史文化特色，而它盛衰的歷史更使人掩捲深思。

中國會館猶如中國宗法制社會的一個縮影，充滿智慧和奮鬥，卻無從擺脫禁錮的枷鎖。了解了會館的歷史，我們至少會思考今日中國最突出需要解決的問題，知道今日中國、今日世界的由來，也更容易了解我們今天應走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懂得了社會主義道路何以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我們今天實行改革開放，工商業界更有責任和義務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從前人走過的路中吸取經驗教訓，認清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和目標，用堅定的信心，創新務實的精神，為偉大祖國的繁榮、中華民族的強盛貢獻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2002年10月18日於北京



目 錄

序	孫孚凌 (5)
導言	胡德平 (7)
會館與歷史:內涵界定與文化含義	(1)
會館的內涵與界定	(1)
會館公所異同論	(4)
會館公所的功能性質	(8)
會館公所和商會的區別與聯繫	(17)
會館的緣起:會館因需發軔與因勢盛衰	(21)
緣起於北京	(23)
時移而漸興	(29)
因勢而盛衰	(50)
會館的類型:會館分類與地域分佈	(65)
京城省城會館與特色	(65)
工商城市會館與特色	(92)
市鎮商貿會館與特色	(107)
移民鄉井會館與特色	(123)
會館地域分佈特點	(142)
會館與市場:商業會館與應市而生	(149)
交通便捷與販運商業的發展	(149)
商人與會館的興辦	(161)
商業會館的內部運作	(170)
會館與移民:會館建設與移民心理	(192)
人口遷移動因與流向	(192)

人口流動與會館建設	(201)
會館與科舉：地域會館與舉子應試	(206)
地域政治觀念與應試會館	(206)
科舉制度與應試會館的互動	(210)
會館與世界：華人會館與文化外播	(218)
華人會館的興起與發展	(219)
華人會館的發展特點	(252)
會館與社會：會館衍生與社會整合	(274)
明清社會關係的變化	(274)
會館與社會整合	(288)
會館與政府的互藉關係	(309)
會館與文化：會館事象與文化內涵	(323)
會館建築文化	(323)
會館信仰風俗	(356)
會館與時代：歷史地位與功能作用	(373)
會館的區域社會中介地位	(373)
會館對文化的繼承與創新功能	(382)
會館的道德維繫功能	(396)
會館與未來：傳承文明與啓智育人	(410)
華夏文明與會館遺產	(411)
會館鑒誠與競勝求存	(412)
歷史啓示與贏得未來	(414)
附 錄：	
各省現存會館一覽表	(417)
參考文獻	(439)
後 記	(442)

CONTENTS

Preface	Sun Fu - ling(5)
Foreword	Hu De - ping(7)
Concep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1)
Implication and Defini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1)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Clan Associations and the Guild	(4)
Function and Attribu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and the Guild	(8)
Difference and Relations among Clan Associations, the Guild an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17)
The Origin of Clan Associations	(21)
Originated in Beijing	(23)
Boomed with the Era	(29)
Rose and declined with the Situations	(50)
Type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65)
The Clan Associations in Beijing and other capital Citi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65)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in Citi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92)
The Trade Associations in Town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107)
The Geographical Trai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142)
Market and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Emerging with the Economics	(149)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and Commerce Development	(149)
Businessmen and the Initia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161)

13

The Operation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170)
Clan Associations and Immigration	(192)
Cause and Orient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192)
Immi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n Associations	(201)
Regional Clan Association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206)
Clan Associations and Local Political View	(206)
The Interac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Clan Associations	(210)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	(218)
Emerg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219)
Th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252)
Clan Associati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formity	(274)
Changes on Social Rela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274)
Social Conformity and Clan Associations	(288)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an Associations and Government	(309)
Features of Clan Associations and their Cultural Implication	(323)
Clan Associations Architecture Culture	(323)
Beliefs and Customs of Clan Associations	(356)
Function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Clan Associations	(373)
The Medi - function of Clan Associations in local Society	(373)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Inherence and Innovation	(382)
The Function of Supporting Ethics	(396)
Cultural Heritage and Education in Clan Associations	(410)
Chinese Cultural and Heritage of Clan Associations	(411)
To draw Inspiration from Clan Associations to develop	(412)
To gain Enlightenments from Clan Associations to win the Future	(414)
Appendix	(417)
Reference Literature	(439)
Postscript	(442)

會館與歷史：內涵界定與文化含義

會館是中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其起源、漸興、繁盛與衰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它是一種歷史事象，更是一種社會、經濟與文化事象，同時又是歷史與時代發展的一面鏡子，因此而具有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文化蘊義。會館雖然作為一度輝煌的歷史事象隨着社會的變遷在歷史舞臺上謝幕了，但是它強大的文化生命力卻在海外華人羣體中得以延續並綻開出絢麗的新花朵，充當着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並在異國他鄉播撒着友誼、文化與和平共處的種子，為豐富多綵的世界經濟、文化構築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綫。

會館的內涵與界定

會館是一種地方性的同鄉羣體利益整合組織，創建會館的目的在於“以敦親睦之誼，以叙桑梓之樂，雖異地宛若同鄉”。每逢年過節或每月之朔望，同鄉歡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戲；故鄉誼、地緣、商情是其羣體聯結紐帶；趨利共享是其整合驅動力；而避禍共存、權益分擔則是其羣體的心理依托。客居異地的官紳、應試舉子、衆商、移民羣體，他們在自身發展中殊途同歸的八大心理需求是：政治上的維護心理需求、市場上的贏利心理需求、客地上的相依心理需求、權益上的捍衛心理需求、文化上的交融心理需求、管理上的自治心理需求、風險上的避害心理需求和前景上的開拓心理需求，則是滋生與育成會館與會館文化的沃壤。對會館的內涵界定與文化蘊義的銓釋，歷來論家蜂起，述說歧出不一；如有的論

16

者認為“會館是明清時期異鄉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它產生於明朝建都北京之後，發展於明朝中葉嘉靖、萬曆時期，差不多有異鄉人聚居較多的地方，就有會館的出現，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是研究明清歷史不可忽視的一種社會結構”^①；又如“會館是同鄉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城市所建立，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業務的場所，狹義的會館指同鄉所立的建築，廣義的會館指同鄉組織”^②；也有的人把會館的存在與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口流動等社會背景聯繫起來，有人把會館分為一般同鄉人的會館和商人的會館^③；有人認為會館可以是同鄉組織，但也可以是同行組織，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象徵，商人在會館設置中有重要作用，甚至試館亦然^④。有人指出：“在北平有廣東會館、四川會館等等，在上海有廣東會館、寧波會館、湖廣會館等等，這些組織是以慈善的機能來助同鄉人，我們認為，毫無疑義的是這些省區會館首先是商業資本的組織”^⑤。如海關監督說浙江的雲貴會館“是這兩省中有產階級和商人的代表聯合起來的”；而南京的會館，“這些俱樂部的會員，當然是從商業階級而來的”；山西各地會館的發生“特別是由商人方面發起的”^⑥。還有人認為：“所謂會館，係寓居異鄉城市中同一鄉貫的官紳商民所建的館舍，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由於商品經濟不斷發展、外出商民不斷增加與城市中土著非土著矛盾日漸加劇而出現的一種封建地方組織”^⑦。總之，會館是以地緣為紐帶，旅居他鄉的同籍人自願自發組織起來的一



修復前的北京湖廣會館古戲樓外景

轉載自《北京湖廣會館誌稿》

- ① 呂作燮：《南京會館小誌》，《南京史誌》1984年第5期。
- ② 何炳棟：《中國會館史論》，第11頁，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版。
- ③ 加藤繁：《清代的北京商人會館》，《中國經濟史攷證》第3卷，第101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
- ④ 寺田隆信：《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鄭天挺紀念論文集》，第561～582頁，中華書局，1990年版。
- ⑤ 全漢昇：《中國行會制度史》，第104頁，新生命書局，1934年版。
- ⑥ 全漢昇：《中國行會制度史》，第104頁。
- ⑦ 韓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40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種社會團體，以敦鄉誼、叙桑梓、答神庥、互助互濟為宗旨。也有人認為會館是同鄉人士在異鄉城市建立的組織。北京的會館最早可推至明永樂朝，本來是同鄉仕宦公餘聚會之所，後來才變成試館、行館，供赴京致試的士子住宿，及候補、候選等官停留。同時則有工商會館出現，商人參與了平時的管理事務^①。它的形成和內容隨時空不斷嬗變。會館由其創建者參加成員的身份而不同，大體可劃分為商人會館（商館）、移民會館、士紳會館（試館）三大類。三者非機械分割，而是常有互相滲透，如移民會館固然主要是工匠等下層鄉人參加，但其發起者卻往往是有聲望的官紳，並充任會首；試館雖是官紳們為同鄉子弟入京應試而設，但亦有不少商人參加其中，並提供資助。實際情況經常是，主要服務於科舉的會館有商業資本滲入其中，主要服務於商人的會館有時是由官紳來掌權，在移民區域的會館既可以是農民會館，也可能是工商業會館，而且設置者的劃分也很復雜。即便不同區域的會館有時也有共同點，即地緣是其組成的基本因素。歷史本來就是復雜的結合體，不可能把某一因素單獨排除出來，會館即如此。因此，研究會館最根本的就是要抓住地緣這一綫索。美國學者威廉·羅（William T. Rowe）指出：“中國會館兼有同行同業組合的雙重特徵”，是一種“複合結構”，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王日根對明清以來會館進行係統研究後認為，會館是明清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遷的特定產物，它不僅是明清時期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必然，而且與明清科舉制度、人口流動相伴隨。會館首先是明清時期易籍同鄉人士在客地設立的一種社會組織，它適應社會的變遷而產生，又不斷改變着自己的形態，對內實行有效整合的同時，又不斷謀求與外部世界的整合。在會館的演進過程中，不僅存在着時代發展的階段性，而且又包含了地域發展的差異性^②。關於會館緣起、性質、功能等海內外學者論述太少，各有側重也有同異，但總體而論，多長於事物具象之描述，少於對會館的全貌攷察和演化歷程中諸多變異形態的全景式闡述。本書竭力為社會各界廣大讀者提供儘可能多的各家之言及有關會館的資料，並為進一步廓清會館的涵義，特將會館與同其相近相關的公所、商會的功能、性質和特點、區別與聯繫進行闡釋比較，只有明確了會館的真正內涵，才可能進一步探討它的緣起、性質、功能及演變等一係列問題。

①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第3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第28～2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會館公所異同論

呂作燮認為會館並不是工商業行會，會館與公所這種行會組織有着根本區別：前者是地域觀念的組織，後者是同業的組織；前者有仕商、工商業者、農民等各色人參加，而後者的參與者僅限於工商業者；本地人不設會館，而本地工商業者都參與一定的行會組織^①。新近的研究既有仍持原來看法主張會館也是行會者，也有同意會館並非行會，但與公所沒有根本區別也無截然界限者。方志遠認為，會館與公所之間有一個遞進關係。一般來說，會館是始起的名稱，公所則是繼起的名稱。會館者，聚會之館舍，叙的是鄉情友誼，氣氛應是寬松的；公所者，公議之場所，議的是利益分配，氣氛則是嚴峻的。雖然明代已有同鄉同行或同鄉多行所結成的商幫，以及由同鄉士人、商人或士商共建的“憩息燕集”場所，但這些場所不僅無一例外地都叫“會館”而不叫“公所”或“公會”，而且無一例外都以籍貫為名而不以行業為名。如“臨汾東館”為山西臨汾紙張、顏料、干果、烟草、雜貨等五行商人共建，但並不叫紙張公所或顏料公所或各業公所。再如山西平遙顏料、油料商人建立的僂翁廟，創始時名為“平遙會館”、“集瀛會館”，清乾隆、道光時，才稱“顏料行會館”，至清末民初，再改稱“顏料行同業公會”。再如山西臨汾、襄陵油商建立的“山右會館”，在清康熙時改稱“臨襄會館”，清末再改稱“油鹽糧行同業公會”。內容決定形式，而形式的變化則反映着內容的變化。平遙會館、臨襄會館、臨汾東館也並非在初建時便是某一行業或某幾個行業的會館，更有可能是同鄉的商人會館，後來才為一個或幾個實力較雄厚的行業所佔據，成為同鄉的行業會館。這一過程與商業或行業的發展是同步發生的。一般來說，前期會館的功能主要是聯絡鄉情及互助，後期會館的功能則主要是規範和協調同業的關係。這種演變是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即由感情因素發展為經濟因素，由同鄉、同行間提供互助發展為規範競爭，由保護外地商人不受本地居民排斥發展為聯合同鄉、同行商人與地方官府及惡霸進行周旋。關於行會，嚴格說來，唐代已有“行”，如米行、肉行、油行、布行、茶行、絹行、絲行等等，卻並沒有“會”，即沒有本行議事的程序和固定的議事地點。明代同鄉會館的出現，其實為“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模式。一旦“行業”建立“會館”，真正意義上的“行會”便產生了。

^① 呂作燮：《明清時期蘇州的會館和公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明代的會館在清代特別是在清中後期紛紛改名公所，新建的會館也一般不叫會館而徑稱公會，正是這種演進的結果。“會館”可以是同鄉聯誼的場所，也可以是同行議事的場所，而“公所”、“公會”，則毫無例外是同行的議事場所，或者說，毫無例外是商人的組織或團體^①。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認為，會館是同鄉的公益團體，不具有行會的職能，只有公所才是行會組織，這種看法，是拘泥於會館公所稱謂的差異，而忽視對二者實質的攷察。就當時上海的情形而言，會館、公所的稱謂，在一部分同業同行團體中是通稱的，說明會館公所的名稱既不是劃分同鄉、同業團體的標誌，也不是區別是否行會組織的依據^②。劉廣京認為會館、公所兩詞，原可會通。但稱公所者到了道光以降漸多為行業的組織，常仍以地方幫為主，但鄉土性漸為沖淡^③。《中國經濟全書·會館及公所》一書記載：“會館、公所者，名雖不同，實則無異。有謂會館為善舉而興，公所為商業而立，然此不過自形式而觀之也。蓋會館為同鄉所組織，以善舉為最多，如設丙舍、設義塚，賜貧困者之棺木，教育無資力者之子弟，諸如此類，不遑枚舉。然其執行商業上之事務，與公所無異。至於公所為同業中所創設，其規約多定於商業之部分，如上海四明公所所行之善舉，與會館亦莫不同。是以會館與公所各有區別，而性質上實無區別也。”^④王日根認為，會館與公所在很多場合往往不易區分，倘若真要說出二者的區別，其主要點當在於，會館往往較多地講究儀貌，公所則更多地注重實效。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謀求發展的處所，會館則往往是大商人躋身於仕途或攀附仕途的根據地。而作為寄寓之地，則中小商人既可棲身公所，又可寄居會館^⑤。

邱澎生認為，會館、公所的成員，基本上都是自願參與結社，並不是由政府或其它外力強迫結社，都具備一定規模的共同財產，並且制訂有一套征收經常性公積金的籌款辦法，都經過向官府立案申請的手續，獲得官府明令保護其公同財產而成立，所以都是一種“自發性”、“常設性”和“合理性”的新興工商社團組織。因此以會館代表同鄉團體，而公所代表同業工商團體的說法，其實是不精確的二分法，失之粗疏。就語義上來說，會館和公所都是商人借來稱呼自己建築物名稱的

①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第564～566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張仲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510～511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③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第33頁。

④ 彭澤益：《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冊，第91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⑤ 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第54～55頁。